

数字金融使用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巩润泽 吴卫星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分析了数字金融使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结果:首先,数字金融使用可以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其次,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提高收入、增强社会信任以及降低社会排斥的方式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最后,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使用在促进女性、低学历以及高年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方面具有更显著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厘清数字金融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关系,完善流动人口相关政策措施,实现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流动人口 社会融入 数字金融

作者简介:巩润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100029;

吴卫星(通讯作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100070。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4)08-0086-1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现象。截至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已多达3.76亿人,较2010年增长了69.7%,占全国人口的26.6%(陆杰华、林嘉琪,2021)。人口流动促进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产业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但由于户籍等因素的限制,流动人口在工作机会、收入水平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当地居民存在较大差距,导致部分流动人口不能较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因此逐渐形成了当地居民与流动人口的二元分割结构,导致中国处于“伪城镇化”状态(田鹏,2023),这阻碍了新型城镇化的实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逐渐引起政府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2023年全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指出“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到更加突出位置”。

鉴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性,众多学者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国外关于社会融入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大多针对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Ivory等,2024)。Smith(2003)发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双循环’背景下的家庭负债行为演变研究”(72373024)。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吴卫星电子邮箱:wxxw@cueb.edu.cn。

现,移民的知识与技能对其社会融入至关重要,受教育水平越高、工作经验越丰富,社会融入度越高。South等(2005)发现,掌握好迁入国语言有助于扩大国际移民的居住范围,进而促进其社会融入。Hamermesh和Trejo(2013)认为,收入越高、在流入地居住时间越长,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水平越高。Lin等(2023)发现,有住房所有权的移民,无论是租来的还是拥有的,其社会融入水平更高。进一步地,Lin等(2020)发现,居住在“商品住房”社区的流动人口在社会经济成就、邻里互动以及社会关系等维度上都实现了更高水平的社会融入。此外,Mai和Wang(2022)发现,居住时间较长确实促进了流动人口的文化融合,而租金上涨显著降低了社会融入水平。

相比之下,国内的社会融入问题较晚受到广泛关注。崔岩(2012)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人口的当地身份认同越强。万思齐等(2020)发现,职业培训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秦立建和陈波(2014)发现,医疗保险降低了农民工的健康风险,可提高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任远和陶力(2012)认为,社会资本也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和社会交往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制度层面,户籍被认为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崔岩(2012)发现,外来居民拥有当地户口可以提高其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伍蔓霖和卢冲(2020)也发现,户籍制度改革能够有效提高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城市的意愿。类似地,办理居住证也会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产生积极影响(梁土坤,2020)。

虽然以往学者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有许多问题尚待研究。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制度因素,关于金融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较少有学者研究。近年来中国金融发展迅速,数字金融的发展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借助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数字金融不仅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还大大提高了小微企业和流动人口等相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和平等性。这些优势使数字金融成为中国激发新金融活力、推进金融业务创新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中国推动传统金融变革、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已有学者发现数字金融在支持创新创业(谢绚丽等,2018)、促进消费(吴卫星、柴宏蕊,2023;何宗樾、宋旭光,2020)、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滕磊、马德功,2020)以及提高社会信任(何婧、李庆海,2019)等诸多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考虑到数字金融在帮助弱势群体获取资金和信息等资源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数字金融是否可以通过提高流动人口的资源可得性,进而促进其社会融入值得研究。目前关于数字金融微观影响的研究大多运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分析。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同一地区不同个体数字金融使用行为的差异。此外,考虑到流动人口普遍属于低人力资本和低物质资本群体,其很可能面临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存在限制了数字金融的积极作用,进而使实证结果不能反映数字金融的真实影响,本文参考何婧和李庆海(2019)以及王小华等(2022),利用微观层面的流动人口数字金融使用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使用数字金融对其社会融入的影响。本文认为,运用数字金融使用数据不仅可以更好地关注不同个体的数字金融使用行为,还有助于分析在突破了数字鸿沟和金融排斥的限制之后,金融发展对弱势群体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可以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提高收入、增强社会信任以及降低社会排斥是其产生影响的主要机制,且这种影响在女性、低学历、高年龄流动人口中更为显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重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状况可有效推进社会管理和建设,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完善流动人口相关政策措施,改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建设规划、服务规划等相关问题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首先,流动人口普遍没有丰富的物质资本,且在流入地没有成熟的社交网络(杨菊华,2015)。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本文样本中有 66.5% 的流动人口学历为高中及以下。这些特点导致流动人口大概率从事低收入、高强度的工作,且在获取信贷资金和信息方面受到限制,进而对其投资和就业等经济金融行为产生不利影响,影响其生活水平和社会交往,叠加户籍等制度因素以及当地居民社会排斥等社会因素,抑制其社会融入。数字金融使用帮助流动人口获取低成本的金融信息和信贷资金,提高其投资便利性以及进行风险投资和创业的可能性,进而增加投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宋林、何洋,2022),促进其社会融入(Hamermesh 和 Trejo, 2013)。其次,有研究发现,由于数字金融使用在支付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构建了透明、安全、高效的信任机制,有助于提高社会信任(杨阳等,2023),进而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任远、陶力, 2012)。最后,数字金融使用有很好的创业效应(何婧、李庆海,2019),创业为流入地创造了税收和工作岗位,缓解了当地居民的就业竞争,同时收入的提高也有助于降低流动人口犯罪的可能性,减少当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排斥,进而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

H1:数字金融使用可以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由于流动人口面临严重的信息和信贷约束,且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此流动人口的收入普遍偏低,较低的收入抑制其社会融入(Hamermesh 和 Trejo, 2013)。数字金融使用缓解了流动人口面临的金融信息和信贷资金约束,高效及时的金融资讯增加了流动人口对金融市场的理解,深化了其对金融产品的认知,加上使其获取了较低成本的信贷资金,促进了其参与金融市场,提高了其投资性收入。此外,通过提高信息和信贷资金可得性,数字金融使用对创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何婧、李庆海,2019)。创业是改变收入结构和收入来源的重要方式,通过创业,流动人口增加了经营性收入。足够的收入保证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能够获取基本服务、购买刚需住房以及维持社会交往,是流动人口正常生活的基础,也是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的前提条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2。

H2: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提高流动人口收入促进其社会融入。

现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增强居民社会信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金融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以支付宝、微信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为商户与购买者搭建了中介平台,构建了信用的中转机制,在支付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构建了透明、安全、高效的信任机制,有助于提高社会信任(杨阳等,2023)。数字支付和数字理财行为需要流动人口通过移动互联网进行对安全性要求极高的金融资产交易,这也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对社会的信任度(何婧、李庆海, 2019),社会信任的提升可以促进流动人口参与当地社会活动,特别是公共事务,不仅有助于扩大流动人口的社交范围,构建当地的社交圈,还有利于培养流动人口的主人翁心态,从而实现流动人口与当地社会的融合。此外,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度越高,其更倾向于以一种平和平等的心态与当地人相处,有助于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环境(任远、陶力,2012),进一步促进其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3。

H3: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增强社会信任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已有研究发现,当地居民对流动人口存在一定的歧视和排斥,一是他们认为流动人口抢占了

他们的工作机会,挤占了他们的生存资源;二是流动人口一直被认为是犯罪高发群体(陈刚等,2009),他们认为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大大增加了地区犯罪案件,导致其生活安全度下降。这种歧视和排斥严重影响了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社会交往,使其无法有效地参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与主流社会出现隔离,不利于其社会融入。数字金融使用不仅可以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还可以提升居民的支付便利性,降低流动人口进行犯罪的可能性(江鸿泽、梁平汉,2022),进而减少本地居民的歧视。此外,数字金融还有显著的促进创业效应(何婧、李庆海,2019),流动人口通过使用数字金融进行创业,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还创造了税收,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进而降低了当地居民的排斥,有利于其社会融入。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4。

H4: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降低社会排斥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首先,关于流动人口数字金融使用以及个人和家庭特征的数据取自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该调查是双年度的纵贯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每次调查访问10000余户家庭,目的是通过对全国居民劳动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方面的长期纵贯调查,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翔实而科学的基础信息。2021年调查区域覆盖了30个省份592个村(居)。每个村(居)的地图地址为抽样框,是实地抽样的基准。调查时抽取相应的家庭,在抽中的家庭中抽取1位受访者进行访问,收集了合格调查问卷10136份。该调查较为全面地掌握了居民的消费、收入、教育、工作、社会参与以及基层组织等众多数据,同时包括了数字金融使用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数据,这些是目前可以获得的最契合数据,为本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其次,关于地区经济变量的数据取自国泰安数据库。

根据段成荣和孙玉晶(2006),流动人口的特征是人户分离,即人们要移动到与户口所在地相距“足够远”的空间位置。因此本文参考已有文献,根据问卷问题“您目前的户口登记地是在哪?”,将回答“外省”和“当前所在省其他县(县级市、区)”的个体定义为流动人口。在10136位受访者中,流动人口有1336位。以1336位流动人口作为基础样本,删掉变量缺失和异常值样本,最后得到有效样本1143个,约占流动人口原始总数的86%。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主要被解释变量为社会融入。参考杨菊华(2015)和崔岩(2012),本文认为社会融入的深化应当建立在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心理认同上,只有实现了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流动人口的“本地化”过程才能得以实现,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才能成为可能。因此参考崔岩(2012),本文以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情况”定义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根据问题“就您目前的生活状况来说,您认为自己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对于回答“本地人”的流动人口,本文认为其实现了心理层面的融入,将社会融入设为1,否则为0。

2.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流动人口的数字金融使用情况,包括数字金融使用和数字金融使用

多样性。本文参考何婧和李庆海(2019),根据流动人口的数字理财行为、数字借贷行为和数字支付行为,定义流动人口的数字金融使用情况。具体来说,如果受访者在网上进行过投资理财,则认为其存在数字理财行为;如果受访者在互联网金融公司(如花呗、京东白条)借过钱,则认为其存在数字借贷行为;如果受访者在网上购物或者获取生活服务,则认为其存在数字支付行为;如果受访者存在数字理财、数字借贷或数字支付行为中的任何一项,则认为其使用了数字金融,将其数字金融使用赋值为1,否则为0。此外,为了测度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本文参考王小华等(2022),受访者每有以上一项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则计1分,最多计3分,得分越高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越高。

3. 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文献,首先,本文选择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教育、民族、保险以及居住时间等变量作为个人特征控制变量。女性在就业市场中常处于弱势地位,收入较低,可能会影响其社会融入水平。年龄较大的流动人口在就业市场中不占优势,而且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弱,因此其社会融入度可能会较低。未婚流动人口的生活压力可能较小,其在买房等需要大额支出的事件上不存在急迫性,同时也不存在子女上学等问题,因此其消费水平可能会较高,这有助于提高其社会融入度。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动人口找到高收入工作的可能性越高,有助于其社会融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习惯可能与流入地的风俗文化不同,这可能会减少其工作机会并提高其生活压力,进而降低其社会融入水平。参与保险可以降低流动人口面临的风险,对其社会融入有益。居住时间越长,越容易融入当地社会。其次,选择住房、收入、消费、父母、子女、父母是否在一起生活以及子女是否在一起生活等变量作为家庭特征控制变量。拥有住房、增加收入和消费提高了流动人口的生活水平,有助于其社会融入。作为亲人,父母和子女的存在以及是否在一起生活会对流动人口的生活幸福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社会融入。最后,选择各省份人均GDP与房价作为地区特征控制变量。地区人均GDP越高,该地区能为流动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越多,这有助于提高其社会融入水平,但同时经济发展越好的地区的物价、房价和落户门槛也越高,这提高了流动人口的生活成本,不利于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地区房价越贵,流动人口购买住房定居的可能性越低,不利于其社会融入。

4. 其他变量

本文的相关变量还包括经济社会地位评价等机制检验变量。

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定义及计算方法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社会融入	受访者的心理认同,认为自己是本地人则赋值为1,否则为0
解释变量	数字金融使用	受访者是否有数字理财、数字借贷、数字支付行为,有任何一种则赋值为1,否则为0
	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	受访者每有一种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则计1分,最多计3分
	数字理财	受访者是否有数字理财行为,有则赋值为1,否则为0
	数字借贷	受访者是否有数字借贷行为,有则赋值为1,否则为0
	数字支付	受访者是否有数字支付行为,有则赋值为1,否则为0

续表 1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计算方法
个人特征 控制变量	性别	受访者的性别,为男性则赋值为1,否则为0
	年龄	受访者实际年龄(2021-出生年份)
	年龄平方	受访者实际年龄的平方/100
	婚姻	受访者的婚姻状况,为初婚和再婚则赋值为1,否则为0
	教育	受访者的受教育情况,最高学历为未上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职业院校、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分别赋值为0、6、9、12、12、12、15、16、19
	民族	受访者的民族,为汉族则赋值为1,否则为0
	保险	受访者的保险状况,有医疗或养老保险则赋值为1,否则为0
家庭特征 控制变量	居住时间	受访者在流入地的居住年数,不足半年者计为0.25年,半年及以上按2021-流入年份计
	住房	受访者的住房情况,在流入地有自有住房则赋值为1,否则为0
	收入	受访者2020年家庭总收入
	消费	受访者2020年家庭总消费
	父母	受访者父母是否至少有一人健在,有则赋值为1,否则为0
	子女	受访者是否有子女,有则赋值为1,否则为0
	父母是否在一起生活	若受访者父母至少有一方与受访者“吃住都在一起”、“住在一起,但不一起吃”或者“吃在一起,但不住在一起”,则认为父母与受访者在一起生活,赋值为1,否则为0
地区特征 控制变量	子女是否在一起生活	若受访者子女至少有一个与受访者“吃住都在一起”、“住在一起,但不一起吃”或者“吃在一起,但不住在一起”,则认为子女与受访者在一起生活,赋值为1,否则为0
	人均GDP	2019年各省份的人均GDP
	房价	2019年各省份的房屋平均销售价格

5. 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研究数字金融使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由于被解释变量为离散的二元变量,故基本模型采用Probit模型。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

$$P(Y_i = 1) = \beta_0 + \beta_1 X_i + \beta_2 C_i + \mu_i \tag{1}$$

式(1)中, Y 表示被解释变量,即社会融入, X 表示解释变量,即数字金融使用, C 为控制变量, u 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总体来看,社会融入的均值为0.51,这表明49%的流动人口还没有实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考虑到中国庞大的流动人口规模,相对较低的社会融入比例

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数字金融使用的均值为0.74,这一比例看似较高,但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均值较低,仅有0.95。数字支付的均值达到了0.74,而数字理财和数字借贷的均值分别仅有0.19和0.03,差异较大。这说明目前流动人口的数字金融使用以支付为主,需要丰富流动人口的数字金融使用行为。此外,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等控制变量均有较大差异。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社会融入	0.51	0.50	0	1	1143
数字金融使用	0.74	0.44	0	1	1143
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	0.95	0.68	0	3	1143
数字理财	0.19	0.40	0	1	1143
数字借贷	0.03	0.18	0	1	665
数字支付	0.74	0.44	0	1	1143
性别	0.44	0.50	0	1	1143
年龄(年)	40.35	13.45	18	69	1143
婚姻	0.73	0.45	0	1	1143
教育	11.16	4.15	0	19	1143
民族	0.93	0.26	0	1	1143
保险	0.68	0.47	0	1	1143
居住时间(年)	9.99	10.51	0.25	68	1143
住房	0.49	0.50	0	1	1143
收入(万元)	12.69	12.87	0.2	98.20	1143
消费(万元)	12.47	14.95	0.1	117.76	1143
父母	0.32	0.47	0	1	1143
子女	0.67	0.47	0	1	1143
父母是否在一起生活	0.13	0.34	0	1	1143
子女是否在一起生活	0.49	0.50	0	1	1143
人均GDP(万元)	7.94	3.27	3.60	16.49	1143
房价(万元/米 ²)	1.15	0.73	0.57	3.59	1143

(二)数字金融使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的基本结果分析

本部分分析了数字金融使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结果见表3。显然流动人口的数字金融使用及其多样性、数字理财以及数字支付行为能够显著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但数字借贷系数并不显著。本文认为数字借贷系数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流动人口中进行了数字借贷的样本太少,在665个观测值中,仅有3.16%,即21个流动人口进行了数字借贷,且进行了数字借贷的流动人口也都有数字理财或数字支付行为,而样本中有51%的流动人口实现了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数字借贷即使可以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也有可能因为样本数量差距过大导致结果不显著。总体来说,数字金融使用可显著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假设H1得证。此外,本文发现,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人口越可能找到好工作,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也就越高,进而越容易融入当地社会;住房和保险是保证流动人口在

流入地稳定生活的基础,因此拥有住房和保险也可以显著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居住时间越长,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越高,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居住时间加长,流动人口不仅适应了当地的生活,而且有时间构建成熟的社交网络,有机会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工作机会,进而有助于提高社会融入水平;父母或者子女与流动人口同在流入地生活可以促进其社会融入,这是因为父母或者子女在身边使流动人口获得了家庭团聚带来的幸福,能够弱化漂泊在外的感觉,从而提高其“本地人”身份的认同,进而促进其社会融入(王春超、张呈磊,2017);地区人均GDP的提高可能会降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度,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落户门槛和生活成本也相应较高,这加大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安居的难度,不利于其社会融入;地区房价越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购买住房进而定居的可能性越低,导致其社会融入度越低。

表 3 数字金融使用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1)	(2)	(3)	(4)	(5)
数字金融使用	0.402*** (0.109)				
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		0.267*** (0.092)			
数字理财			0.262** (0.122)		
数字借贷				-0.275 (0.296)	
数字支付					0.375*** (0.117)
性别	-0.081 (0.086)	-0.084 (0.088)	-0.087 (0.087)	0.003 (0.097)	-0.080 (0.086)
年龄	-0.028 (0.030)	-0.030 (0.030)	-0.026 (0.029)	-0.027 (0.035)	-0.029 (0.030)
年龄平方	0.040 (0.033)	0.040 (0.033)	0.031 (0.032)	0.022 (0.040)	0.040 (0.033)
教育	0.037** (0.014)	0.034** (0.014)	0.040*** (0.013)	0.050** (0.020)	0.038*** (0.014)
婚姻	-0.141 (0.119)	-0.124 (0.120)	-0.132 (0.117)	-0.338* (0.175)	-0.144 (0.118)
民族	0.183 (0.136)	0.164 (0.135)	0.157 (0.139)	0.162 (0.193)	0.184 (0.137)
住房	0.612*** (0.085)	0.598*** (0.087)	0.592*** (0.090)	0.581*** (0.127)	0.613*** (0.085)
保险	0.292*** (0.095)	0.287*** (0.095)	0.304*** (0.094)	0.368*** (0.117)	0.296*** (0.096)
居住时间	0.013*** (0.005)	0.014*** (0.005)	0.014*** (0.005)	0.010* (0.005)	0.013*** (0.005)
父母	-0.071 (0.160)	-0.075 (0.156)	-0.084 (0.156)	-0.302 (0.186)	-0.072 (0.160)
子女	0.068 (0.135)	0.078 (0.135)	0.093 (0.137)	0.077 (0.128)	0.066 (0.135)

续表 3					
	(1)	(2)	(3)	(4)	(5)
父母是否在一起生活	0.304** (0.150)	0.311** (0.147)	0.315** (0.146)	0.367 (0.225)	0.302** (0.150)
子女是否在一起生活	0.214* (0.125)	0.215* (0.125)	0.199 (0.126)	0.297** (0.148)	0.219* (0.125)
ln(收入+1)	0.002 (0.054)	-0.006 (0.057)	0.005 (0.057)	-0.005 (0.071)	0.003 (0.054)
ln(消费+1)	-0.061 (0.060)	-0.061 (0.060)	-0.053 (0.056)	-0.107 (0.077)	-0.061 (0.060)
ln(人均 GDP+1)	-0.241** (0.099)	-0.232** (0.104)	-0.222** (0.107)	-0.334** (0.135)	-0.273*** (0.099)
ln(房价+1)	-0.200** (0.093)	-0.242** (0.092)	-0.264*** (0.094)	-0.608*** (0.140)	-0.172* (0.095)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 ²	0.1592	0.1597	0.1552	0.1748	0.1582
样本量	1138	1138	1138	660	1138

注:括号内是经过省份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实证分析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导致回归系数失真,因此本节运用工具变量方法进行了内生性检验。参考何婧和李庆海(2019),本文选取了按照县域和受访者年龄分组后的数字金融使用平均水平作为工具变量,样本按照年龄段划分为 5 个子样本,分别为 18~30 岁、31~40 岁、41~50 岁、51~60 岁和 61 岁及以上,然后选择同县同年龄段流动人口样本的数字金融使用及其多样性平均水平作为工具变量,再运用两阶段 IV-Probit 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4。从第(1)和(3)列的第一阶段结果可以看出,F 统计值分别为 40.96 和 40.13,超过 10% 的临界值,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2)和(4)列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及其多样性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与表 3 结果一致,说明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 4 内生性检验结果

	数字金融使用		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	
	(1)	(2)	(3)	(4)
	一阶段	二阶段	一阶段	二阶段
数字金融使用		0.760*** (0.200)		
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				0.458*** (0.135)
数字金融使用工具变量	0.898*** (0.036)			
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工具变量			0.848*** (0.036)	
F	40.96		40.13	
Wald 检验		212.93		212.1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138	1138	1138	1138

(三)数字金融使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的机制分析

1.收入机制

本部分检验数字金融使用是否通过提升流动人口收入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首先,本文考察了数字金融使用是否会提高流动人口的客观收入,结果见表5。需要说明的是,本部分机制检验中的收入为流动人口的个人收入。由于本文的流动人口数字金融使用是一种个人行为,而家庭总收入的增长可能是由家庭其他成员的工作收入增加而引起的,若采用家庭总收入进行机制检验,可能无法有效反映数字金融使用对收入的影响。因此该部分我们采用流动人口的个人收入,检验数字金融使用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第(1)和(2)列结果说明,数字金融使用可以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具体来说,数字金融使用使流动人口的个人收入提高53.9%。第(3)和(4)列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分别提高了流动人口的投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说明数字金融使用给流动人口带来的金融信息以及信贷资金可有效帮助其投资金融市场或者助力其进行创新创业,提高了其投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经济基础是保证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正常生活的前提,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也被认为是其实现心理层面社会融入的必要一环(杨菊华,2015),收入的提高满足了流动人口的物质需求和社交费用,因此促进其社会融入,假设H2得证。目前既有学者分析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居民个体的影响,也有学者研究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为了保证实证分析的全面性和稳健性,我们也分析了数字金融使用对流动人口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家庭收入的提升也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说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①

表5 数字金融使用与流动人口收入

	总收入		投资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
	(1)	(2)	(3)	(4)
数字金融使用	0.539* (0.303)		2.179*** (0.269)	0.106 (0.569)
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		0.535** (0.21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 ²	0.2059	0.2094	0.2338	0.1292
样本量	1143	1143	1143	665

注:第(3)列的解释变量为数字理财,第(4)列的解释变量为数字借贷,收入均做了取对数处理,本表实证方法为OLS。

其次,本部分考察数字金融使用对流动人口主观相对收入的影响。主观相对收入是指流动人口对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主要是与本地区其他居民相比。本文认为,人是否觉得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身边其他人的对比。因此本文采用三个变量对流动人口的主观相对收入进行度量,分别为:“邻居”,流动人口若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与邻居相比“好很多”“好一些”“差不多”,则赋值为1,否则为0;“本市县的人”,流动人口若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与本市县的人相

① 为了节省篇幅,该部分结果未展示,留存备案。

比“好很多”“好一些”“差不多”,则赋值为1,否则为0;“经济社会地位”,流动人口若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处于“上”“中上”“中”,则赋值为1,否则为0。实证分析结果见表6。由第(1)和(2)列的结果可知,使用数字金融的流动人口更可能感受到相对生活水平的改善,从而认为其生活水平不低于邻居。虽然第(3)列中数字金融使用的系数不显著,但其仍为正值,综合第(4)列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使用数字金融的流动人口更可能认为其生活水平不低于本市县的其他人。第(5)和(6)列的结果说明数字金融使用也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对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评价。表5和表6结果说明,数字金融使用不仅可以提高流动人口的客观收入,还可以提高其主观相对收入,进而促进其社会融入。

表6 数字金融使用与流动人口主观相对收入

	邻居		本市县的人		经济社会地位	
	(1)	(2)	(3)	(4)	(5)	(6)
数字金融使用	0.289** (0.126)		0.073 (0.126)		0.189* (0.103)	
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		0.219*** (0.072)		0.170*** (0.056)		0.184*** (0.06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 ²	0.1055	0.1063	0.1088	0.1118	0.0637	0.0659
样本量	1066	1066	1097	1097	1137	1137

2. 社会信任机制

本部分分析数字金融使用是否可以增强流动人口社会信任,进而对其社会融入产生积极影响,实证结果见表7。社会信任可被认为是对陌生人或者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是一种事先关于任何随机选择的个体的行为方式有多大可能是诚实的、值得信任的信念(李涛等,2008)。社会信任的增强有助于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活动,扩大其社会交往范围,进一步促进其社会融入(任远、陶力,2012)。本文将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分为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总体社会的信任,并采用了三个指标来全面度量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首先,流动人口流入某地后,在办理一些手续时必不可少地要面对政府部门,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增加了流动人口的权利平等感,进而促进其社会融入(徐延辉、史敏,2016),因此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应该包括在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中。本文构建“政府信任”变量,若流动人口对中央、区县和乡镇政府“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则赋值为1,否则为0。其次,本文将流动人口对社会信任的总体评价也包括在内。若流动人口认为社会信任度并未下降,那么他也是信任社会的。因此本文构建“社会信任”变量。若流动人口认为中国不存在社会信任度下降的重大社会问题则赋值为1,否则为0。最后,为了保证实证分析的稳健性,本文还采用了“社会安全”变量,即以流动人口对社会安全的评价来度量社会信任。若流动人口认为社会比较安全,那么他更可能会信任社会。若流动人口认为总体社会安全状况“很安全”和“比较安全”,则赋值为1,否则为0。表7列出了数字金融使用对流动人口社会信任影响的分析结果。由第(1)~(4)列的结果可知,数字金融使用可以显著提升流动人口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度。虽然第(6)列中数

字金融使用多样性的系数不显著,但其仍为正值,综合第(5)列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数字金融使用提高了流动人口的社会安全评价。表7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确实增强了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促进其社会融入,假设H3得证。

表7 数字金融使用与流动人口社会信任

	政府信任		社会信任		社会安全	
	(1)	(2)	(3)	(4)	(5)	(6)
数字金融使用	0.451** (0.174)		0.461** (0.199)		0.405** (0.196)	
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		0.376** (0.159)		0.201** (0.100)		0.052 (0.16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 ²	0.1247	0.1288	0.0768	0.0615	0.0854	0.0769
样本量	910	910	1089	1089	959	959

表8为数字金融使用对流动人口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分析结果。本文以两个变量来代表流动人口的社会组织参与。首先构造变量“兴趣组织”,若流动人口参与了兴趣组织则赋值为1,否则为0,以此变量代表流动人口休闲娱乐方面的社会交往。此外,构造变量“公益社团”,若流动人口参与了公益社团则赋值为1,否则为0,以此变量代表流动人口公共事务方面的社会交往。显然,数字金融使用可以促进流动人口参与当地的兴趣组织与公益社团。表7与表8的结果说明,数字金融使用确实可以通过增强社会信任促进流动人口参与社会组织,提高其社会互动水平,助力于其社会交往,扩展其社交网络,进而促进其融入当地社会。

表8 数字金融使用与流动人口社会组织参与

	兴趣组织		公益社团	
	(1)	(2)	(3)	(4)
数字金融使用	0.587*** (0.170)		0.451*** (0.120)	
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		0.367*** (0.064)		0.196*** (0.06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 ²	0.1860	0.1890	0.0993	0.0963
样本量	1142	1142	1114	1114

3. 社会排斥机制

本部分检验数字金融使用是否可以通过降低社会排斥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结果见表9。

社会排斥是指某些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社会主流关系网络之外的一个动态过程。被排斥群体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杨菊华,2012)。被排斥群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联系断裂,与主流社会隔离,会在极大程度上抑制其融入当地社会。本文以三个变量代表流动人口是否面临社会排斥。首先本文构造“社会宽容”变量。问卷调查了流动人口对社会宽容程度的评分,评分范围为1~10分,1分表示受访者认为社会非常不宽容,10分表示受访者认为社会非常宽容。若评分为6~10分,本文认为流动人口认为社会总体是宽容的,将“社会宽容”赋值为1,否则为0。其次构造变量“无冲突”,即流动人口认为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社会冲突状况,“没有冲突”和“不太严重”则赋值为1,否则为0。最后构造“社会公平”变量。问卷调查了流动人口对社会总体公平公正情况的评分,评分范围为1~10分,1分表示受访者认为社会非常不公平,10分表示受访者认为社会非常公平。若评分为6~10分,本文认为流动人口认为社会总体是公平的,则将“社会公平”赋值为1,否则为0。若流动人口认为社会是宽容的、本地人与外地人无冲突或者社会是公平的,本文认为这说明其在流入地的生活过程中很可能没有遇到由于其外来身份而被歧视和排斥的情况,因此这三个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代表流动人口是否面临社会排斥。第(1)、(3)、(5)列的结果说明,使用数字金融的流动人口不仅认为社会是比较宽容的,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没有严重的社会冲突,而且倾向于认为社会总体是公平的。第(2)、(6)列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的系数不显著,第(4)列的系数显著性也较低。这可能是由于使用数字金融即可减少流动人口面临的社会排斥,而使用数字金融的种类数量重要程度较低。综合表9结果,可以说明数字金融使用减少了流动人口感受到的社会排斥,进而有助于其融入当地社会,假设H4得证。

表9 数字金融使用与流动人口面临的社会排斥

	社会宽容		无冲突		社会公平	
	(1)	(2)	(3)	(4)	(5)	(6)
数字金融使用	0.266** (0.131)		0.475** (0.196)		0.198* (0.107)	
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		-0.009 (0.085)		0.260* (0.155)		-0.028 (0.07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 ²	0.0738	0.0700	0.0978	0.0950	0.0827	0.0806
样本量	1143	1143	545	545	1143	1143

(四)数字金融使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本部分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性别、学历以及年龄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分别见表10和表11。显然,数字金融使用对女性、低学历以及高年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帮助更大,似无相关模型检验结果也支持此结论。女性、低学历和高年龄流动人口在就业市场中常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找工作困难,或是从事低工资、无保障、不稳定的工作。不仅较低的工资限制了女

性、低学历和高年龄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生活压力也迫使他们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来提高收入,导致休闲娱乐时间不断缩减,进一步降低其生活幸福度,进而影响其社会融入水平。通过使用数字金融,女性、低学历和高年龄流动人口可以显著增加收入,不仅可以提高消费能力,降低生活压力,还可以增加闲暇休息时间,有助于提高生活幸福度,进而提高社会融入水平。因此数字金融使用更加有助于女性、低学历和高年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表 10 数字金融使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异质性影响

	男	女	高学历	低学历	高年龄	低年龄
	(1)	(2)	(3)	(4)	(5)	(6)
数字金融使用	0.073 (0.181)	0.720*** (0.141)	0.363 (0.849)	0.371*** (0.094)	0.463*** (0.105)	-0.019 (0.26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 ²	0.1875	0.1959	0.2521	0.1751	0.1981	0.1974
样本量	498	637	372	756	677	446

表 11 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异质性影响

	男	女	高学历	低学历	高年龄	低年龄
	(1)	(2)	(3)	(4)	(5)	(6)
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	-0.018 (0.148)	0.571*** (0.116)	0.012 (0.185)	0.344*** (0.090)	0.300*** (0.085)	0.261 (0.17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 ²	0.1872	0.2054	0.2509	0.1795	0.1951	0.2033
样本量	498	637	372	756	677	446

(五)稳健性检验

1. 国内移民的社会融入分析

流动人口和迁移人口的区别在于户籍,迁移人口发生过户籍变动,而流动人口是人户分离(段成荣、孙玉晶,2006)。近年来,大部分地区的落户政策逐渐宽松,许多人流入新地区不久便可获得当地户籍,从流动人口变为迁移人口,但其在迁入地的社会关系等资源仍可能处于相对匮乏的状态,导致其社会融入水平不高,因此迁移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本文根据问题“您的户口是哪一年迁到所在地区的”,将回答“自最初实行现户籍制度/出生就是”的群体视为原始本地居民,而将最近三年迁到本地的群体视为迁移人口。参考叶文平等(2018)以及杨勇和吕杰(2021),将流动人口和迁移人口的总和定义为国内移民,并分析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国内移民社会

融入的影响,结果见表 12。显然,数字金融使用对国内移民的社会融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果说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表 12	数字金融使用与国内移民社会融入				
	(1)	(2)	(3)	(4)	(5)
数字金融使用	0.284** (0.112)				
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		0.184** (0.085)			
数字理财			0.193* (0.108)		
数字借贷				-0.152 (0.284)	
数字支付					0.247** (0.12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 ²	0.0994	0.0994	0.0975	0.0957	0.0985
样本量	1249	1249	1249	1249	1249

2. 跨省流动人口与省内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分析

本文的流动人口样本主要包括两类:户口登记地在外省的流动人口,即“跨省流动人口”以及户口登记地在当前所在省其他县(县级市、区)的流动人口,即“省内流动人口”。二者虽然都为流动人口,但还是有较为明显的区别的。相比之下,省内流动人口无论是在文化适应、社会网络构建还是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获取方面都比跨省流动人口更有优势,因此数字金融使用是否对不同流动范围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均有显著影响值得关注,实证结果见表 13。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跨省流动人口和省内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本文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 13	数字金融使用对不同流动范围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			
	跨省流动人口		省内流动人口	
	(1)	(2)	(3)	(4)
数字金融使用	0.488** (0.241)		0.360** (0.162)	
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		0.257* (0.151)		0.247* (0.13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 ²	0.2202	0.2169	0.1288	0.1298
样本量	438	438	652	652

3. 更换指标

本部分更换社会融入指标来检验本文结果的稳健性。在综合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可用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度来衡量其社会融入水平。若流动人口认为其生活较为幸福,对生活水平较为满意,则说明其不仅生活状况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精神层面上的需求也得到了较好的满足,在社会交往等方面也可以达到日常需求,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其融入了当地社会。因此我们用流动人口对生活满意度的评分来度量“生活满意度”,若为6~10分,则认为流动人口对家庭总体生活状况是满意的,赋值为1,否则为0。此外,本文构建变量“幸福度”,若流动人口对于“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这种说法“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则赋值为1,否则为0。实证结果见表14和表15。在更换指标之后,数字金融使用仍然提高了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度,说明结论稳健可靠。

表 14 数字金融使用与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	
	(1)	(2)
数字金融使用	0.280* (0.164)	
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		0.279* (0.146)
控制变量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Pseudo R ²	0.1296	0.1338
样本量	578	578

表 15 数字金融使用与流动人口幸福度

	幸福度	
	(1)	(2)
数字金融使用	0.352* (0.202)	
数字金融使用多样性		0.177 (0.148)
控制变量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Pseudo R ²	0.1669	0.1635
样本量	536	536

五、 结论和建议

本文利用 2021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分析了数字金融使用对流动人口社会

融入的影响。总的来说,数字金融使用促进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提高收入、增强社会信任以及降低社会排斥是其重要的影响机制。此外,数字金融使用更有助于女性、低学历和高年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这可能是因为女性、低学历和高年龄流动人口在就业市场中常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工资低,或是工作压力大,这不利于其社会融入。使用数字金融有助于提高其收入,缓解他们的收入劣势,进而减轻其生活压力,增加休闲时间,提高生活幸福度,最终促进其社会融入。工具变量法、扩大样本、分类样本以及更换指标的稳健性检验表明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大力发展数字金融,同时要关注金融排斥与数字鸿沟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应提高互联网可及性并加强流动人口的互联网和金融教育,提高流动人口的数字素养和金融素养,鼓励流动人口使用数字金融,有助于促进其社会融入。(2)关注流动人口的收入情况,扩宽流动人口的收入渠道,提高其收入水平,不仅有助于改善其生活状况,也可以促进其社会融入。(3)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活动参与以及社会交往问题,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组织和公共事务参与度,促进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更积极正面地进行社会交往,减少社会排斥,使其更好地融入流入地社会,助力于新型城镇化的实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刚、李树、陈屹立:《人口流动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4期。
2. 崔岩:《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3. 段成荣、孙玉晶:《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人口研究》2006年第4期。
4. 何婧、李庆海:《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1期。
5. 何宗樾、宋旭光:《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财贸经济》2020年第8期。
6. 江鸿泽、梁平汉:《数字金融发展与犯罪治理——来自盗窃案刑事判决书的证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10期。
7. 李涛、黄纯纯、何兴强、周开国:《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
8. 梁土坤:《居住证制度、生命历程与新生代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基于2017年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20年第1期。
9. 陆杰华、林嘉琪:《中国人口新国情的特征、影响及应对方略——基于“七普”数据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
10. 秦立建、陈波:《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管理世界》2014年第10期。
11. 任远、陶力:《本地化的社会资本与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人口研究》2012年第5期。
12. 宋林、何洋:《数字金融对农村流动人口创业收入的影响》,《当代经济科学》2022年第3期。
13. 滕磊、马德功:《数字金融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吗?》,《统计研究》2020年第11期。
14. 田鹏:《超越城乡的新型城镇化——理论框架、多重逻辑与实现路径》,《人口与经济》2023年第4期。
15. 万思齐、秦波、唐杰:《流动人口的职业培训与城市融入——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综合调查的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20年第12期。
16. 王春超、张呈磊:《子女随迁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2期。
17. 王小华、马小珂、何茜:《数字金融使用促进农村消费内需动力全面释放了吗?》,《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11期。
18. 吴卫星、柴宏蕊:《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水平均衡提升了吗——基于消费相对剥夺缓解的视角》,《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19. 伍菱霖、卢冲:《户籍制度改革会促进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城市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人口与发展》2020年第5期。
20. 谢绚丽、沈艳、张皓星、郭峰:《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4期。
21. 徐延辉、史敏:《社会信任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2期。

22. 杨菊华:《社会排斥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三重弱势》,《人口研究》2012年第5期。
23. 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24. 杨阳、吴子硕、尹志超:《移动支付对家庭股市参与的影响》,《管理评论》2023年第1期。
25. 杨勇、吕杰:《国内移民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和经济集聚的视角》,《管理工程学报》2021年第5期。
26. 叶文平、李新春、朱沅:《地区差距、社会嵌入与异地创业——“过江龙”企业家现象研究》,《管理世界》2018年第1期。
27. Hamermesh, D. S., & Trejo, S. J., How Do Immigrants Spend Their Time? The Process of Assimilation.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26, No.6, 2013, pp.507-530.
28. Ivory, T., Chilhaya, G. K., Takenoshita, H., Insider Out: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Foreign-Bor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weden, and Jap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58, No.1, 2024, pp.117-146.
29. Lin, S. N., Wu, F. L., & Li, Z. G.,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Across Chinese Neighbourhoods. *Geoforum*, Vol.122, No.6, 2020, pp.118-128.
30. Lin, S. N., Wu, F. L., Wang, Y., & Li, Z. G., Migrants' Perceived Social Integration in Different Housing Tenures in Urban China. *Geoforum*, Vol.139, No.6, 2023, 103693.
31. Mai, X., & Wang, J. J., Situational Differences, Migratory Dur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Cities*, Vol.125, No.6, 2022, 103596.
32. Smith, J. P., Assimilation across the Latino Generat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3, No.2, 2003, pp.315-319.
33. South, S. J., Crowder, K., & Chavez, E., Geographic Mobility and Spatial Assimilation among US Latino Immigran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39, No.3, 2005, pp.577-607.

Digital Financ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GONG Runz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100029)

WU Weixing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100070)

Summary: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China has witnessed a large-scale flow of labor force. By 2020,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reached 376 million, an increase of 69.7% over 2010, accounting for 26.6%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However, due to various factors, a major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annot access the same public services as local residents, and as a result cannot be well integrated into the local society, and gradually a dual partition structure of local residents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is formed, leading to the "pseudo-urbanization" state. Promot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elps to not on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but also enhance social harmony. At present,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more and more eager to integrate into the host city. How to encourag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fully participat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city, and finally integrate into the urban society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facing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s to "advance people-centered new urbanization and work faster to grant permanent urban residency to eligible people who move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for forming the new development dynamic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 a faster pace. The 2023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Work Conference also called for "attaching greater prominence to granting permanent urban residency to eligible people who move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Although scholars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issues to be studied. Most previous studies focus on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with few on the impact of finance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Using the 2021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use of digital

finance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general, the use of digital finance promotes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mainly by increasing their income, enhancing social trust, and reducing social exclusion. In addition, the use of digital finance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women, the poorly-educated and the old, perhaps because these people are relatively disadvantaged in the job market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they need more help from digital finance. Finally, the robustness test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expanded sample, classified sample and replacement index show that the conclusion is robust and reliable.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resul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irst of all, we should vigorously develop digital finance,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exclusion and digital divide on vulnerable groups. We should improve the accessibility of the internet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net and financial education amo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mprove their digital literacy and financial literacy, and encourage their use of digital finance, which will improve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 level. Secondly,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com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expand their income sources and raise their income, which will not only improve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but also facilitate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 Finally,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ctivities and social exchanges, increas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promote more positive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and local residents, reduce social exclusion, and help them better integrate into the destination city, to achieve new urba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although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digital finance have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scholars rarely analyze its impact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provides a detailed explanation. This paper has not only enriched existing literature, but also further revealed the micro-mechanism via which digital finance affects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deepened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is among the few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financ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Secondly, this paper uses the micro-level data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digital finance use behavior for empirical analysis, while most of the current relevant studies use the macro regional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The approach used in this study can better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digital finance by different individuals. Finally, this paper uses a variety of methods to test robustness, which makes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more convincing.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als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inance on social integration.

Key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Digital Finance

JEL: G30, J11

责任编辑:诗 华